

· 哲学传统研究 ·

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及其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张庆熊

摘要: 罗蒂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相当复杂。罗蒂通过批判欧洲近代哲学的“表象论”的认识论路线和早期分析哲学的“图像论”语言观而得出某些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结论。从这一角度看,罗蒂与法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一样都致力于解构形而上学。然而,罗蒂的实用主义立场又导致他在文化观等方面与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分道扬镳。罗蒂从实用的效果出发肯定现代性和世俗社会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并且他还为技术理性、人本主义和怀抱希望的浪漫主义精神正名,批评后现代主义一味解构和不提出任何致力于改造社会的理想蓝图。至于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究竟新在何处和有无问题,可将其与传统的实用主义论点和后现代主义的论点相对照。

关键词: 罗蒂;新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技术理性;文化政治

中图分类号: B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47(2024)03-0043-52

罗蒂(Richard McKay Rorty, 1931—2007)是美国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有难解难分的关系。罗蒂前期在认识论和真理观方面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等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分享许多共同的观点,因此罗蒂也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弄潮儿。罗蒂后期又在文化观等方面激烈批判后现代主义,好似杀了一个冷不防的回马枪。罗蒂是公共文化平台上的活跃人物,喜欢辩论,而且他爱剑走偏锋,常常成为争论的焦点,总是有人反对,有人捧场。罗蒂仿效苏格拉底的反讽手法,对于欧陆形而上学和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信奉者,

作者简介: 张庆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2017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方法论新形态及中国化研究”(项目编号:17JZD041)阶段性成果。

他都挖苦和挑刺，像是在他们每个人的耳朵里都放入了一个虫子。罗蒂反对纯粹哲学，他甚至宣称哲学死了，自己退出哲学系跑到文学系去任教。罗蒂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关注现实的社会世界中的实际问题，并善于用饱含文学色彩的言辞激发人们的注意。实际上，罗蒂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还是比较复杂的。笔者尝试把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与德里达、福柯等法国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相对照，以便清楚地界定和揭示罗蒂的哲学、文化观和社会政治思想的特点。

一、自然之境与在场的形而上学

罗蒂和德里达都批评西方形而上学。罗蒂用“自然之境”(the Mirror of Nature)这个隐喻刻画西方传统哲学的特征。这表现为：以主客二分、表象与对象二分、能指与所指二分为特征；心灵犹如一面镜子，心灵中的感觉和观念犹如镜子中的镜像；认知在于正确反映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事物及其规律，真理就是主观与客观、表象与对象、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符合或一致。罗蒂认为这些都是“镜像论”的误导，需要用实用主义的工具论取而代之。他主张：“我们既不需要区分实在与表象，也不需要区分被发现之物与被制作之物。我们希望用较为有用的事物与较为无用的事物之间的区分来取代实在与表象之间的区分。”^①在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德里达的观点。德里达用“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表述西方传统哲学的特色。这表现为：认识上的确定性和可靠性以“在场”为依据；只有在场才有直观，才能获得明证性；认知者亲自在场，亲眼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事实，这是真理。“在场”为一切认知和概念体系的建构提供牢靠的基础，然而这种“在场”的学说本身无凭无据，是一种必须被解构的形而上学。

从字面上看，“在场”和“显现”可以用同一个英文单词“presentation”表示，而事物在意识中的“再现”(representation)就是“表象”。由此看来，“在场”“显现”与“再现”是紧密关联的，在词源上本是同根生。罗蒂谈“镜像”，德里达谈“在场”，他们在刻画西方形而上学特征方面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都针对西方传统哲学的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真理论，即真就是事物的显现(presentation)与其在意识中的再现(representation)相一致。尽管罗蒂谈“再现”是从英美经验主义和分析哲学传统的“表象论”和“图像论”出发的，而德里达谈“再现”是从德法现象学的传统出发的，但他们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用分析哲学的话来说，真是命题(语言图像)与发生

^① 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黄勇编、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的事情的一致。用现象学的话来说,真就是面向事情本身,就是既不添加也不减少地描述事物直接给予的东西,如其所是地描述真正呈现的现象。罗蒂和德里达都反对这种再现论和符合论的真理观。

当然,如果细加考究,他们之间还有一些微妙的差别。德里达是经由海德格尔的基本存在论而走向解构主义的。“在场”是从存在论上说的。从动词形态上分析,“在场”(be present)意味在此出场(在此存在)。“表象”则着眼于认识论,从动词形态上分析,“表象”具有“被再现为”(be represented as)的结构。在德里达看来,从“在场”到“再现”之间必然有一个“延异”(différance)的过程。“延异”是存在论上发生的状况,因而存在论上的“延异”决定了通过“在场”获得认识论上明证性的道路必然是走不通的。罗蒂则采纳语用学的论证方式,主张某物的在场和心智对它的认识之间关系必定受到人的行动和语言的用法的影响,指称及其涵义总是随着人的有目的的行动和语言行为的使用效果而变化。这就决定了“自然之物”与其在人心中的“镜像”之间不可能一致,因而符合论的真理观不能成立。罗蒂从而主张,传统哲学的真理观和寻求认识确定性的思路都建立在“镜像”的隐喻上,但这条道路被证明为是走不通的。他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指出:“俘获住传统哲学的图画是作为一面巨镜的心的图画,它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表象(其中有些准确,有些不准确),并可借助纯粹的、非经验的方法加以研究。如果没有类似于镜子的心的观念,作为准确再现的知识观念就不会出现。”^①因此,他采用“哲学和自然之镜”作为书名,评述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路的失误。

说到这里,读者也许要问:西方近代哲学有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传统,“镜像”这个隐喻似乎只适用于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传统,为何罗蒂要用“自然之镜”来刻画包括笛卡尔的唯理论在内的整个西方的哲学传统呢?洛克认为原初的心灵就像一块白板,一切观念都来自后天的经验,就像刻入白板上的记号。洛克的认识论看来是与镜像说相符合的。但笛卡尔主张存在天赋观念,何以理解天赋观念是镜像呢?按照罗蒂的看法,把镜子比喻为心,把镜像比喻为心中的观念,要点在于刻画西方传统哲学所持的那种意识行为与意识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之间的二分法。洛克所说的感觉对象(例如“石头”之类的外在的物体对象),笛卡尔所说的天赋观念(例如“数”之类的内在的观念对象),都可以被视为意识行为所指向的对象,它们反映或浮现在心中,都是心中的观念,在此意义上都可被视为心中的镜像。在罗蒂看来,白板说和天赋观念说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源于“自然之境”的联想,即把心当

^① 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7页。

成一面镜子，无论它反映或浮现的是外部世界中的东西还是内部世界中的东西，在此意义上都可被视为心中的镜像；他们在思与所思、意识行为与意识对象的二分法方面是一致的。

当然，认知可能会发生错误或曲解，这好比镜子的不平整、被尘埃污染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因此需要修理平整和拂拭擦亮。在罗蒂看来，西方传统认识论中有关修正心智认识的种种理论都是源于心智好比镜子的隐喻。借用中国佛教哲学偈语“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的表述，它们都赞同“心如明镜台”的立论，其差别是拂拭方式不同。不论罗蒂在写《哲学和自然之境》这本书的时候是否知道中国佛教哲学中的这个经典偈语，镜子与拂拭之间的关系在罗蒂眼中成了西方认识论的核心思路来源。我们通常认为欧洲近代哲学的经验论与唯理论和先验论尖锐对峙，洛克和休谟的经验论主张经验观察是认知的基础，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唯理论主张清楚明白的观念和原理是认知的基础，而康德的先验论主张认知的先天的结构对认知起着制约作用。在罗蒂看来，他们在认知的“镜像论”这一基本点上是一致的，其差别仅仅在于经验论强调要通过不偏不倚的经验观察来提高认知的正确性，唯理论强调通过提升理智的明锐眼光和分析的能力把握心中的观念和原理，先验论强调要通过琢磨认知的先天形式和范畴来提高认知的能力。换句话说，他们的差别只在于修磨和拂拭这个心智的镜台的不同方式上。现代分析哲学以语言转向为标志，通过语言分析批判形而上学。但在罗蒂看来，分析哲学并没有走出镜像论的窠臼。他断言“‘分析的’哲学是另一种康德哲学”^①，因为分析哲学不过是把心灵对事态的再现关系转换为语言对事态的再现关系，把对认知形式的分析转化为对语言形式的分析。语言的图像论无非心灵的镜像论的变体，语言分析实质上是认知形式分析的变体。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一个从作为认知的入口处的心灵着手，一个是从作为认知的出口处的语言着手，因而分析哲学对语言的这种强调，基本上未曾改变康德的思考认知问题的架构。

总之，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境》一书的基本思路是把西方以往的主流哲学都纳入“镜像论”中去，而把它们之间的差别归结为修磨和“拂拭”这个心智的“镜台”的不同手法。罗蒂写道：“如果没有类似于镜子的心观念，作为准确再现的知识观念就不会出现。没有后一种观念，笛卡尔和康德共同采用的研究策略——即通过审视、修理和磨光这面镜子以获得更准确的表象——就不会讲得通了。如果心灵中不怀有这种研究策略，认为哲学可由‘概念分析’‘现象学分析’‘意义阐释’、检验

^① 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境》，第23页。

‘我们语言的逻辑’或检验‘意识构成活动的结构’等晚近的主张就不可理解了。”^①

二、真理概念和话语三角形

罗蒂从反驳“自然之境”出发否定传统的真理概念，特别是反对符合论的真理概念。按照他的看法，既然不存在准确再现实在的“镜子”，那就谈不上有什么与实在相符的真理。那么什么是真理呢？罗蒂自己认为他采取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即把“真理”理解为“有用”，主张真理无非是一种有助于我们成功地完成事务的信念而已。他写道：“我主张，这些思想路线在以某种方式被拓广之后，就会使我们把真理看作——用詹姆士的话来说——‘更宜于我们去相信的某种东西’，而不是‘现实的准确再现’。或者用不那么具有挑激性的话来说，这些思想路线向我们证明，‘准确再现’观仅只是对那些成功地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想要完成的事务的信念所添加的无意识的和空洞的赞词而已。”^②

当然，罗蒂的这种真理观是否与经典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契合是有争议的。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主张，为了澄清概念和陈述的含义，要把直陈式的语句转化为条件—命令式语句加以检验。举例来说，“金刚石是比玻璃硬的”这句话可以转化为：“如果金刚石是比玻璃硬的，那么用金刚石刻玻璃，玻璃上就会有刻痕。”如果不能完成这样的转换，说明这句话的意义是不明确的。这也就是说，一句话的意义是否明确，取决于这句话能否转换为可被检验的语句。由于检验涉及辨别真假的问题，语句的意义就与判别真假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由此可见，语句的真值函项在皮尔士那里被视为澄清意义的关键。因此，至少在经典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那里，“真理”决不是一个“空洞的赞词”。

罗蒂口口声声说他继承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但在笔者看来，罗蒂对杜威的解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杜威的愿意。我们知道，杜威提倡“思想五步法”或“探究五步法”。它包括以下五个步骤或环节：（1）在不确定的情境下行动；（2）感受到问题和努力找到疑难之所在；（3）设想各种各样的解决问题的办法；（4）通过理性推导和借鉴历史经验选择较好的方案；（5）确定“事实—意义的可操作特性”（the Operational Character of Facts-Meanings）。这种“五步法”的关键在于最后一步，因为停留在理论上的观念是空洞的，不可操作的高谈阔论是一无所用的，只有把语句的意义与事实相关联才能获得可操作的特性，理论或假设必须在“操作”中体现

① 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第27页。

② 同上书，第25页。

其价值，并在操作中检验其效用或真假。这一步实际上是皮尔士的澄清概念的“条件—命令式”构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它突出可操作性的要求。这里的可操作性要求意味对理论的真假或假设能否成立设定了一个检验标准。

罗蒂在对实用主义思想方法的解释中突出了“情境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情境的不确定性”指情境总是在变化的，人的生存条件总是在变化的；不同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下人都面对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境，并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生存方式。“意义的不确定性”指语言的用法和人对语词的意义理解总是随着语境而变化的，不会有超越语境的确定不移的语词的意义。在罗蒂看来，语词的意义取决于说者、听者和环境的“三角形”关系，而在这“三角形”中的说者、听者和环境这三条边都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这使得意义的确定性成为不可能。你如果要断定某句话是真的，你就必须确定这句话的意义，而现在有关语词意义的这三条边都在变化。你根本就无从判定某句话是真的。

罗蒂的这种观念可谓绝对化的语境主义，它导致意义的语境相对主义，并从而得出否定“真理”这个概念的结论。罗蒂有关话语三角形关系的说法来源于戴维森。罗蒂认为他自己实际所做的就是把戴维森的观点解释得更加清楚一些，但戴维森认为罗蒂的解释过头了。^①戴维森引入话语“三角形关系”是为了阐明“真理”与“意义”的关联性，阐明话语是一种在一定的语境下说者和听者的互相交谈的过程，阐明对一句话的真假的判断不能隔离话语共同体对它的意义的诠释和理解，但并没有得出要抛弃真理概念的结论。在罗蒂对话语交往三角形关系的解说中，你有你的理解，他有他的理解，再加上语境的变化，判定一句话的真假根本就不可能。在戴维森那里，话语三角形关系不仅表明语词意义的动态变化性，而且表明话语的说者、听者、语境三条边之间互相关联和互相印证。在一个语言的共同体中，言说者自己对语词的意义理解要参照旁听者对语词的意义理解，言说者对语词的用法要参照旁听者的用法习惯。说者和听者在共同的语境中进行对话，他们之间的意义理解是互相参照和互相印证的。如果他们之间发生分歧，他们通常能够找到互相认可的验证方式。正是基于语言对话和语言行为的三角关系中互相参照和互相验证的确定性，戴维森主张，一个句子之所以具有某种用法是因为其具有某种真值条件，而其具有某种真值条件是因为其具有某种用法。我想可以举如下例子来说明戴维森的观点：两个老同学离别多年在异国他乡巧遇。一个说，你有点面熟，你是不是上海某某大学的张三；另一个仔细辨认一下后说，你是不是上海某某大学的李

① 参见理查德·罗蒂：《实用主义哲学》，林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第32—35页。

四。然后，他们通过互相回忆在大学生活和学习过程中的一些事情确认他们之间的同学关系。他们是否是同学是一个真值判断，异国他乡是变化的语境，在互相对话中讲述过去的经历是印证他们的同学关系的真值条件。这就是说，尽管语境是在变化的，但通过互相沟通和互相印证作出真假判断依然是可能和必要的。

三、分析罗蒂对后现代主义的接纳和批评及其遗留问题

罗蒂的思想看起来直白简明，其实相当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他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上。一方面罗蒂与后现代主义者分享许多共同的观点，他们一起批判形而上学和揭穿“所与神话”，另一方面罗蒂又起来批判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观和政治观，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误导了民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就前者而言，罗蒂的新实用主义被认为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甚至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就后者而言，罗蒂俨然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杀手，宣告后现代主义走入死胡同。罗蒂的这种与后现代主义既同道又纠葛的关注值得我们重视，并需要认真分析其缘由。

称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这是因为他与法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在反基础主义、反普遍主义和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方面分享许多共同的观点。所谓反基础主义就是不承认知识有牢不可破的基础，反对那种知识必须扎根在原初真理基础之上的主张，不论这种真理被视为当下准确再现的经验真理，还是一再重复再现的必然真理。所谓反普遍主义就是不承认任何普遍有效的原理、准则和规范，反对那种把某些原理、准则和规范树立为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永恒真理和普遍价值观的做法。所谓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反对建构以逻各斯为中心的概念体系的做法。这意味否定西方自柏拉图以来两千多年的哲学传统，认为那种以概念分析和逻辑演绎为中心的研究哲学的方式已经走进死胡同，必须加以废弃。在此意义上，他们甚至宣称“哲学死了”。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罗蒂和德里达在反基础主义的论证上的共同点。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提出的“反镜像论”与德里达所说的“反在场形而上学”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针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支柱“所与神话”。当德里达用“在场形而上学”标识西方传统哲学特征的时候，他所针对的不仅仅是西方经验主义的“白板说”之类的反映论传统，而是也针对唯理论的理智直觉说。在德里达看来，概念体系的基础需要通过在场的明证性获得保证。在场有两种：一种是时空中发生的在场，如“一只猫在这张席子上”，它具有当下的亲眼所见的明证性；另一种

是“恒常在场”(constant presence),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其明证性在于我们总能直观到这种关系。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唯理论哲学中的一个典型的“恒常在场”的命题。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差别在于前者看重“恒常在场”,后者看重在时空中所发生的在场。在德里达看来,它们都以在场为认识论基础。然而,由于“延异”,这两种“在场”都不能成为明证性的保证。再说,任何言说和书写都要用记号(sign)来表达,记号的能指和所指并非是确定不移的。记号及其承载的意义总是在使用中发生变迁,因而没有必真的命题,只有在记号流动的踪迹中所表达和所理解的命题的意义,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相对真理。在罗蒂看来,把心智视为镜子的这条思路是错误的。为什么错了呢?他主要借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罗蒂写道:“如果我们接受维特根斯坦的看法,把语言当作一种工具而不当作一面镜子,我们就不会去寻求语言再现作用可能性的必要条件了。”^①罗蒂所说的“镜像理论”可对照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所说的“图像理论”来理解:一个语言的命题好似一个事态的图像。后期维特根斯坦认识到这种语言的图像理论是错误的,因为语言的用法是多种多样的,语言的用法受到语言规则的制约,而语言规则好似游戏的规则,是语言的共同体在生活过程中形成并随着生活形式的变化而改变的。

然而,罗蒂的说法太极端了,容易导致否定任何确定性的相对论立场。我觉得罗蒂对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有过度的解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并非一定导致相对主义,因为他把语言的用法和规则的关系比作河水与河床的关系:河床是相对固定的,而且语言中的某些常识命题起着抛锚的确定性作用。在罗蒂看来,否定了语言的图像理论,就等于否定了准确再现的可能性,从而就没有确定的真理可言。

罗蒂主张否定“准确再现”观意味着必须接受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在我看来,这值得商榷,即便在实用主义阵营内也未必一定会同意罗蒂的说法。我们知道,皮尔士发明了“实用主义”这个词,用于表述“实验学家”的一种思想特征,把概念的定义与对其肯定或否定的实验结果联系起来。皮尔士虽然谈到实用主义关注理论及其概念对生活行为所带来的结果,但注意澄清概念和科学实验对理论的检验标准,即科学实验的普遍可观察性和最终趋向的一致性。詹姆斯把“真理”当作“兑现价值”,无视现实世界对于人的行动的执拗特征。这导致否定真实效果与虚假效果、物理作用与心理作用的区分,从而抹杀真理的实在性。詹姆斯的这种相对主义的真理观曾遭到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士的批评。面对“实用主义”这个概念被滥

^① 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第24页。

用,皮尔士抱怨“实用主义”这个词已被庸俗化了,所以想把他的理论改称为“实效主义”(Pragmatism),并说这个名称“丑陋不堪,足以免遭拐骗”。^①我想,皮尔士对詹姆斯的批评也适用于罗蒂。

尽管罗蒂在认识论和真理观上的一些说法太夸张,太简单化,论证不够严密,常常不能自洽,即便在实用主义的学术圈内也招致戴维森等哲学家的许多批评,但他眼光敏锐,对许多实际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对文化和政治问题上的一些看法,往往切中时弊,有先见之明,值得我们重视。下面我们通过将他的实用主义视角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相比较,指出其中的要点:

第一,罗蒂坚持实用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只有当能让人们在现实情境中找到能尝试解决问题的选择时才有用。因此,他主张,应少谈一些隔空遥远的抽象理论,多谈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也即应尽可能贴近现实,直面问题,谈论那些能够付诸行动的想法。后现代主义则不是这样。他们喜欢谈论遥远的过去,喜欢高谈阔论各种各样的文化学说和远古历史,如“原始人类学”“部落神话学”“性史”“疯人院史”等等;他们热衷于讨论“跨文化的正义是否可能”“道德有无规范性的基础”“我们与他人之间是否隔开无限距离”之类一千年也不会有明确答案的问题。罗蒂批评后现代主义不提出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的方案,不给人带来希望,哪怕连“乌托邦”也没有。

第二,罗蒂区分文化政治和现实政治,认为美国的学院左派在过去几十年里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过分执迷于所谓以“承认”为标识的社群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而越来越少关注阶级利益和经济再分配的现实政治,从而迷失了政治改革的大方向。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固然是美国社会中的一个顽疾,但其根源还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结构中。过分强调黑人等种族歧视问题,反而会使得美国人口中占多数的白人工人和职员感到两面受压。左翼政治运动的优先顺序应该仍然是以劳工阶级为基础,团结工会成员,改革经济分配中的不合理状况,提高广大民众在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方面的社会福利,以及在接受教育和应聘求职方面的公平机会。

第三,罗蒂主张为“技术理性”正名,因为“技术理性”是解决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中不断涌现出来的许多问题的必要手段。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技术理性”是被污名化的,“技术理性”被当作技术至上、无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实现对人的操控的工具。罗蒂赞同杜威的看法,主张实用主义就是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就是在寻

^①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 (ed.),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Volume V, §414.

找和提供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在此意义上工具理性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名称。人是适应环境的动物，“技术理性”指一种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的能力。“技术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人类在过去和将来都不得不依靠它求生和发展。同样，文化也不应从形而上学或神学的角度加以解释和理解。文化的价值体现在人类的生存方式上，好的文化能够促进人类健康地生存发展，坏的文化阻碍人类健康地生存发展。把裹小脚和拉长脖子之类的文化风俗视为美，尽管实用主义可以宽容，因为这毕竟是人家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的选择，但绝不会赞同，因为这毕竟不利于人的健康生存。

实用主义倚重技术理性，寄希望用技术理性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处理现代社会面临的危机。这是罗蒂所持的实用主义观点与后现代主义观点的根本区别。然而，罗蒂不承认有什么可靠的知识 and 符合事实的真理，把“真理”仅仅理解为易于获取成功的“赞词”。秉持这种真理观，就否定了客观规律，就很难说明什么是获取成功的科学方法论，就很难把技术理性和真知灼见统一起来。这又会像后现代主义一样滑向相对主义。这不仅与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士的注重澄清语词的意义和理论检验的真理观是有区别的，而且也遭到戴维森等同代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反对。

（责任编辑：韦海波）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condition of human existence, the premise of human needs and even the boundary of human development.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 logic reveals two key problems of the technological existence of human, that is, the capitalist application of machine system shapes technological body of human and constructs the specific premise of technological existence. The factory system furtherly turns human into the technological subject, namely a subject with non-subjectivity that embodies the subjectivity of capital.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approach of technology criticism, *Das Kapital* has a paradigm position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chnological existence. The technological existence of human is an indispensable dimension of the realistic conno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Das Kapital*.

Key words: capital logic; Marx; *Das Kapital*; the technological existence of huma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Rorty's New Pragmat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ostmodernism

ZHANG Qingxiong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rty and postmodernism is quite complicated. Rorty draws some conclusions similar to postmodernism by criticizing the epistemological line of "representationism" in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y and the linguistic view of "picture theory" in early analytic philosophy.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Rorty, like Derrida and other representatives of French postmodernism, is committed to deconstructing metaphysics. However, Rorty's pragmatic stance led him to separate from the French postmodernists in cultural views and other aspects. Rorty affirmed some positive factors in modernity and secular society from the practical effect. Moreover, he also justified the spirit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humanism and hopeful romanticism, and criticized postmodernism for blindly deconstructing and not putting forward any ideal blueprint for transforming society.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Rorty's new pragmatism, but in order to explain where Rorty's new pragmatism is new and whether there is any problem, this paper also takes care to compare it with the traditional pragmatic argument and the postmodernist argument.

Key words: Rorty; new pragmatism; postmodernism; rationality of technology; cultural politics

• On Feng Youlan's "Negative Method" of Philosophy

YAN Tao

Abstract: Mr. Feng Youlan has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explaining the so-called "negative method" of philosophy, namely the mystical method. He believes that the negative approach to the ontology of the universe is to "not say it" but "manifest it". He has conducted multiple inspections of the "manifestation" of Zen Buddhism, but many explanation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due to the u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form of "six classics annotating me". His own formulation of the "table display" formula - the new "five digit" theory - was also unsuccessful. The so-called "manifestation" is essentially just an alternative statement, repeating the reflexive paradox of "saying cannot be said" in various ways.

Key words: Zen; Wittgenstein; negative method; manifestation

• What is Heidegger's Nothing: An Interpreta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Analytic Philosophy

XU Min DENG Guifang

Abstract: R. Carnap heavily criticized M. Heidegger's inauguration lecture at University of Freiburg. According to Carnap, all of Heidegger's metaphysical claims about "nothing" are pseudo-statements, which cannot be true or false. A historical regret is that Heidegger did not make any explicit response to Carnap. I argue that Carnap's arguments against Heidegger are not decisive, and they propose an interpretation of Carnap's